

# 欣喜和惆怅交错下的自然吟咏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赏析

● 郑州大学文学院 王允亮

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终于再也无法忍受频被拘制、违逆本性的官场生活,决然辞去仅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令,重新回到了平静淡然的田园生活。在达成夙愿的同时,他挥毫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该文文字恬淡简约,意境潇洒自得,笔致婉转,悠然天成,被欧阳修称为“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辞》一篇耳”(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三)。流风遗韵,沾溉后人良多,千百年下读来犹令人神往不已。

世人多称誉陶渊明胸怀的淡泊平和,但这篇辞里,在表面的欣喜和释然后,却一直有一种无法排遣的惆怅充溢其中,时时不自觉地迸发出来。整篇文章也能感受到作者对这种感情的压制和排遣,行文也随之欲断而复续,将作而遽止,开合变化,自然成文。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开篇自问自答,突兀警醒,说明归去之思久已在心中盘桓,现出一种深深的呼唤和归属感,写出郁积已久的感情。接下来作者连用六个排比句以尽情地倾吐自己对以前“误落尘网中”的悔恨之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化用《论语·微子》楚狂接舆和孔子的故事,写出作者不得已归隐的无奈之情。“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现在作者终于觉悟要去追求自己向往已久的生活了。陶渊明有志山林,在辞官之前即多有表达,如作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的《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中的:“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讷有几,纵心复何疑。”元兴三年(公元404年)的《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中说:“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在尘网中羁縻这么多年后,作者终于决定和官场彻底决绝,终老田园了。在微曦的晨光中,站在轻盈的船头,迎着凉爽的清风,想着将要见到亲切的家园和一身轻松的田园生活,心中自有抑制不住的喜悦。遥遥轻舟和飘飘微风恰是作者辞官之后闲适心情的一种显露,“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

微”,不停地向行人问前方的路程,感叹时间的停滞不前,这一行动充分表现了作者迫切的还家之情。

如果说前面写归途,下面则为抵家之情。“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传达出作者目睹久违家园那种难以自制的欣喜和激动。“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以下几句则体现出浓浓的亲情。孩子和家人在热切地盼着“我”的归来,久违的松菊和小道仍然没有改变,也等着“我”回来,和官场的污浊相较,这里是多么令人放松和惬意。作者笔下物皆带人情,写出重返自然的亲切。“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以下几句则可算是对自己隐居生活的描写,在从容不迫中现出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本真。“眄”字透露出一种不经意间的闲适,怡然自得之情跃然纸上。“倚南窗以寄傲”系从陆云《逸民赋》“眄清霄以寄傲”变化而来,从不染尘埃的清霄到普通家居的“南窗”可以看出,陶渊明文章中的生活气息不同于其他山林隐士文章的不食人间烟火,这也是陶渊明作品的一个鲜明特征。“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写尽作者不受外务干扰,潜心于田园生活的自足和欢娱。“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则是作者对田园生活发自心底的一种欣赏与陶醉,特别是出岫之云和倦飞归鸟这一神来之笔,成为后人传诵不衰的名句,体现出人和自然的融洽合一,在这里,“云”“鸟”即是作者的化身,它们的无心出岫和倦飞知还正是作者出仕和归隐生活的简括。作者的全副心智已然贯注于这二物之上,进入忘我境界,实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所标翥的物我合一的“无我之境”。后来王维《终南别业》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杜甫《江亭》诗中的“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作为闲适心情的外化,物象对心象的显露上,与此都有异曲同工之妙。“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翳翳,昏暗的样子。将灭之景,荒径孤松,虽仍是一种孤寂之趣,但作为作者心情的流露,同前面的忘我闲适欢娱相



比,已经有种浅浅的惆怅从心底滋生出来,显出作者情绪的渐转低下。

接下来,作者在酣畅的行文过程中突然插入“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既是对前面逐渐低落情绪的自我宽慰和排遣,也使渐趋平缓的文势为之一顿,避免了略无生气的平铺直叙,正如潺潺流水为之一荡,后面是更激越的水流,在这个顿挫之后,作者点出了“世与我而相违”,说明自己隐居的苦衷。对于这一顿挫,宋蔡戡云“首云归去来,中间又云归去来兮,分为二篇而了无端绪,如庄列言大道纵横飘忽而中自有绳削,但人不得而窥蹈之耳”(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九),深得此辞行文之妙。

经过此次顿挫之后,所述的景物同先前有所不同。首先是季节的变换,如果之前是冬天的话,现在则明写春天之事,如果以前作者的活动是在庭院左右的话,现在则是“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足迹已经到了广阔的大自然中去了。“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春天的一切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令人欣喜。“善万物之得时”,颇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宋程颢《秋日偶成之二》)委化乐天的淡泊胸怀,然而作者转念“感吾生之行休”,不觉令人怅然自失,一边是天地万物的悠悠不尽,一边是个体生命的转瞬即逝,两相对比更显现出一种深深的悲哀来。

接着,作者又对自己进行宽解,是为文章的第二个顿挫。“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其中让人体会到的更多是一种无奈的自我宽慰,作者真的能对世间功业毫不在意吗?这种不经意间袭上心头的惆怅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貌似旷达的表面下的所思所感。陶渊明少有大志,受儒家六经熏陶,渴望像先祖陶侃一样建立一番功业,重振家族的辉煌和光荣,他在《杂诗》第五中“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表现出的正是这种奋发蹈厉的精神风貌,然而污浊的现实和令人窒息的门阀制度却使作者始终郁郁不得志,不得已发出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第二)的悲叹。至此,我们可以理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实是始终郁结胸中之惆怅的一种不自觉的迸射,这种不遇于世的块垒是无论怎样的美酒也无法浇开的。短

暂的迸发后,作者又用旷达来对这种悲愤进行化解和压制,但在这如电光石火的数个瞬间,却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的愤慨和不甘、他旷达隐逸背后的苦闷、淡泊的表面下深深的用世之心。后来苏轼就说:“渊明非达”(《苏轼文集》卷六十五),因为个人的理想和壮志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联系陶渊明写此辞时正当壮年(陶作此辞时年龄后人颇有分歧,但最晚不到41岁)而无奈选择隐居,心中苦闷可想而知。即使到公元409年,隐居四年之后,他在《己酉岁九月九日》的诗中仍抒发“从古皆有没,念之心中焦”的怅然之情。

从“怀良辰以孤往”以下,是文章的另一转折,写对归隐的潜心。“或植杖而耘耔”,“植杖而耘”用《论语·阳货》中长沮、桀溺故事,也显示出世道黑暗污浊,避世的不得已。“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则是作者完全纵心于自然。如果说在前面仍稍有不平之气的話,那现在则是完全安天命,与物终始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为全篇作结,余响悠悠,绕梁不绝。

对于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学界颇有争议。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系年》中根据辞中“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所述事情同序文中“已巳岁十一月”时间的明显矛盾认为此辞序写于义熙元年,辞则写于义熙二年。钱钟书先生则根据序文认为“《辞》作于‘归去’之前……叙启程之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求之于古,则《诗·东山》第三章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意中已有‘鸛鸣于垤,妇叹于室,洒扫穹窒’等情状,笔法庶几相类。”(《管锥篇》)相较而言,钱钟书先生所说较有说服力,周振甫先生也主此说。可以说,先解决此篇作品的写作时间是理解这篇作品的一个关键。换句话说,作者在这里所写大部分为自己对未来生活的美妙设想而已。至于田园生活的甘苦他不是不知道,在这篇辞的序文中他就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这恐怕才是田园生活的实相,而陶渊明之所以把它写得如此悠然自得,令人神往,也许可以看作是对自己心中惆怅的强以宽慰,与此相始终的则是那种一直萦绕于文中的郁郁之情。作者用美好的想象来安慰自己,在失落和自足相交错的感情起伏中,自然吟咏,妙手成文。

本辞行文曲折有致,共经两次顿挫和化解,第一次为在家之怡神后,紧接着是顿挫和转折,写尘世和田园



## 谈新材料作文的“主角度”与“副角度”

◎江苏省兴化中学 张日辉

近两年来，新材料作文在高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高三的备考中，新材料作文的训练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作文教学的重点。突破新材料作文的第一关便是审题立意，因为稍不留意，就有偏题跑题之嫌。如何让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握命题意图，选准切合题旨的立意角度，就成了语文教师要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现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新材料作文这种命题形式，从本质上讲，是材料作文，但它给定材料，不给定话题，要求既不像材料作文那样“过死”，也不像话题作文那样“过宽”。过去的材料作文，总有最佳立意，而现在的可有多个立意角度，只要符合材料的意蕴即可。

新材料作文立意角度一般可概括为两类，即主角度与副角度。“主角度”就是作文材料中重点表现的人与事或着重指出现象，材料的主旨往往就是通过“主角度”得以体现、揭示。它往往占了材料的主要篇幅或显要位置，包括材料中的主要人物、核心事件、概括评论性语句或倾向性用词、不言自明的价值评判标准等。如2016年全国卷Ⅲ作文材料是小羽研发新式花茶的故事，那么小羽创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气度、品

格就是“主角度”。所谓“副角度”，即不属于材料核心事件或主旨，不占主要篇幅或显要位置，非评论概括倾向性语句，但包含在材料内容范围之内。

例如，在一份高三模拟卷中有这样的作文材料：

300多年前，建筑设计师克里斯托·莱伊恩受命设计英国温泽市政府大厅。他应用自己工程力学的丰富知识和多年来的实践经验，巧妙地设计了只用一根柱子支撑的大厅天花板。市政府权威人士进行工程验收时却说只用一根柱子支撑天花板保障不了大厅的安全，责令莱伊恩再多加几根柱子。莱伊恩争辩无效，只好在大厅内增加了4根柱子。不过，这4根柱子实际上并未与天花板接触。直到前几年，市政府准备修缮大厅的天花板时，才发现这个秘密。消息传出后，世界各国的建筑专家和游客云集，当地政府对此也不加掩饰，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特意将大厅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对外开放。

很显然，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来伊恩，主体事件是来伊恩设计政府大厅，起初他有创意地设计用一根柱子，后来受“市政府权威人士”的“责令”，只好加了4根柱子，事件的最后结果是300年后发现来伊恩加的柱子

的对比，生不逢时的悲愤，以委心于田园作结。第二次则由时节万物而觉人生无儿的惆怅，是个体生命有限和宇宙悠悠无穷的矛盾，以乐天委化来化解。综观之，全文虽然篇幅短小，但婉转周折，曲尽其妙。作者经过两次顿挫，曲折盘旋之后，更拔高一层，揭出乐天委命的主题。诚所谓“萧散冲淡，如行云流水，出于自然，而变化开合，涵泓演迤，自有无穷之趣”（黄仲昭《未轩文集》卷四）。

魏晋时期老庄玄学盛行，本文中“齐万物”“一死生”的思想也十分鲜明，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云云正是如此。在这种淡泊的胸怀下，那天际

孤云、空中飞鸟、平常之庭柯、日涉之小园，无不是作者心象向外投射的对象，与作者声息相通而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体现出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的酣畅与快意。自陶渊明发端，这种“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语）的审美艺术精神便深深融入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中，形成了恬淡闲适一派，陶渊明也因此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悠然自得的主流下却有着强烈惆怅难抑的暗流，这种情感上的复杂性使得文章波澜起伏，摇曳多姿。作者的行文随着情感的变化而疾徐迟骤，不失节奏，方寸之地开合转折，圆融无滞，随心所欲，通篇神完气足，无怪乎被誉为两晋文章之冠冕。